



现代社会的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何以同一

——兼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建构

刘国胜

摘要: 如何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同一,这不仅构成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且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旨归。由于资本与人的生存所构成的“二律背反”决定了思想上理论与实践的“二律背反”,所以无论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当代自由主义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直接同一。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思想出发点,创立了对现实生活过程科学认识的历史观,从而推进了现代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统一。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现实建构,它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需要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需要的具体的现实的同一。

关键词: 现代性; 理性主义; 自由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矛盾与建构实质上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与统一,呈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实践的需要,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展开。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理论与实践的视界融合成为现代性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对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认识,必须深刻把握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同一性问题。

一、理性之路:现代性的致思与建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们十分关心的重要命题。从古代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规定来看,虽然他讲到的“哲学”是“第一哲学”,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形而上学,但是,他所说的“哲学”也涉及到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指向“存在自身”以外的有意义的“存在者”,所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实践科学”。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理解,表达了他对哲学本质的认识和对实践的关注,这无疑直接推动了近代哲学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康德在答复“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明确阐述了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一方面,康德指出了启蒙的必要性:“任何一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①;另一方面,康德表达了启蒙的可能性:“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

^①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

是无可避免的。”^①康德所谓的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不仅揭示了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彰显了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对于公众的解放意义和现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德这里所论及的启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实质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就是理论要掌握群众的问题。康德对启蒙的理解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②,从而将理性与自由原则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呈现出来,理性以及“运用理性的自由”也就构成了康德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后来的福柯很看重康德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的主张,称之为“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③。康德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系统考察和全面批判,颠覆了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基础,为现代社会理性原则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开启了现代性致思与建构的基本路向。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理性启蒙与实践自由的重要思想。如果说康德通过为自然立法来为道德立法,为现代性开辟了一条认识论通道,那么,黑格尔则力求通过哲学和现实的结合,推动现代性摆脱外在规范的束缚,在绝对理念的运动中确证自身和实现自己。所以,与康德相比,黑格尔实现了理性的存在意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视域转换。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不应回到神学那里求助自身存在的根据,而应该从它那个时代里去发掘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精神。黑格尔“把现在的开始安放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样一个转折时期的那个时刻”,意指“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④。基于从现代性那里所获得的深切体悟,黑格尔要求将现代性提升为哲学问题,以求得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自我理解,认为这是哲学的一项使命,即从思想的高度把握现代,这项使命被黑格尔自己称之为“对哲学的要求”,这也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⑤在探究理性的过程中,黑格尔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是要通过理性来确立自我意识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主体性,这也是自笛卡尔以来近代意识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黑格尔作为近代意识哲学的集大成者,当然不会舍弃这一原则。但是黑格尔并非将之直接等同于现代性。现代性必须接受哲学的拷问。黑格尔认为,要描绘现代性的外观,就必须将这种主体性原则理解为“自由”和“反思”。不可否认,这种主体性原则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不仅直接主导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深刻影响科学、政治法律、道德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各个领域。由此可见,黑格尔之所以要表达出一种“对哲学的要求”,是因为只有哲学才能借助“绝对”理念概念,重建理性和社会破裂的总体性,证明理性是一种真正的一体化力量。

马克斯·韦伯沿着近代意识哲学所开辟的理性之路,继续推进理性和社会的统一与和谐。韦伯是西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一个用“专门知识”概括出一个“现代性现象学的轮廓”^⑥的“奠基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那样以抽象的形式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将现代性直接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进路是以“合理性”概念来开展对“资本主义精神”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论证。一方面,韦伯以实证科学的方法阐释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西方现代社会的一致性。韦伯认为,“就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形成而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企业(有时仅仅具有有限的资本核算的理性化程度)在所有的世界文明地区(kulturländer)都已存在。换言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企业一直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中世纪欧洲,就像它们存在于现代西方一样”,“然而,西方赋予资本主义的那种重要性程度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西方并发展出实现这种重要性的、在其他地方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类型、形式及趋势”^⑦。另一方面,韦伯力图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联系,以此构成现代性的本质根据。在韦伯看来,“正是最近几个世纪里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构

①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

②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3页。

③ 福柯:《何为启蒙》,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429页。

④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0页。

⑥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⑦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

成了我们的关注中心,而不是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典世界和在中世纪都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将会看到,所有那些地方恰恰都缺乏这种独特的伦理”^①。这种“独特的伦理”就是世俗伦理,就是理性化的世俗伦理。韦伯将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区别开来,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新教伦理来赋予现代性的外在形式,呈现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教伦理也是一种“宗教”观念,在理性化、世俗化的途中,它承载着近代意识哲学理性主义的历史重任,正是这一新教伦理,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塑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才使“西方”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区别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②把“合理性”当作是架构现代文明的一种视角和方法,这就是韦伯继承和发展理性主义传统、推进现代性实践的基本构思。

二、现实批判:“新的发展道路”之开辟

众所周知,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为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信念和规范清除了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最终推翻封建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经过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建构,西方资本主义以超出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发展书写了现代性的“神奇”。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表明,现代性的“神奇”与“腐朽”同在,“普适性”与“局限性”并存。究其原因,不仅表现在实践需要的欠缺,而且也表现在理论需要的矛盾。

卢卡奇曾说过:“古典哲学把它的生存基础的所有二律背反都推到了它在思想中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极点,它尽可能地在思想上表达了这些二律背反,但对这种哲学来说,它们仍是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③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根源于“意识的物化结构”。对于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来说,“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让我们试试看,如果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认识一致,是否能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任务”^④。康德提出了近代批判哲学的任务:认识必须与认识对象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对认识的前提即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批判性考察。通过考察,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因为世界划界为“此岸”和“彼岸”、“现象”和“物自体”而呈现出不同的认识能力,人的理性能力只表现在认识“此岸”、“现象”,而不能认识“彼岸”、“物自体”。康德这一思想尽管为上帝保留了一块精神地盘,从而为信仰预留了一定的文化空间,但康德对自然和历史的认识还是充满了信心。根据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考察可知,自然和历史作为认识对象是在人的认识之列的。可以说康德对理性能力的考察为理性主义^⑤原则和方法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理性主义那里,人的知性具有创造性,可以控制、预见和计算“现象”。所以,“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⑥。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理性主义解决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实现了“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的认识目标,从而为现代性构建起真正的形而上学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理性主义在科学问题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所确立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认识自然提供了“作为总体的认识的指导方针和标准”^⑦,但在人的问题上,理性主义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人的存在的‘最终’问题被禁锢在人的知性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⑧从思维方法上讲,这与理性主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的存在问

①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8页。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6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7页。

④ 转引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8页。

⑤ “理性主义”概念有着严格的界限,在卢卡奇看来,这一概念“不能抽象地和非历史地滥用。我们必须始终明确规定与它有关的对象(即生活领域),特别是必须始终明确地规定那些与它无关的对象”。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0页注释①。

⑥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0页。

⑦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8页。

⑧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0页。

题的思维有密切关系。维科曾说过：“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①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②这些论述表明，不仅自然史和人类史有区别，而且对于人类史来说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式中是自然联系还是社会历史因素占据优势的区别。理性主义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理性主义实质上是用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自然和社会历史问题。这样的历史观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

思想上的“二律背反”是社会生存基础上的“二律背反”的反映。“德国古典哲学把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了极点，而作为哲学基础的所有对立都汇合在这一对立之中。德国古典哲学抓住这一对立不放，而且力求系统地加以把握。”^③尽管近代理性主义批判哲学在方法论上发展了辩证法，但因为无法冲破来自生存基础和思想两个方面的“二律背反”这一强大的悖论逻辑，理性主义所蕴含的现代辩证法精神最终被其历史观所窒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两重“二律背反”的逻辑结构表明，要克服现代性这一历史悖论，不仅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将辩证法从唯心史观中拯救出来，真正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认识和现代生活中的权威。

通过对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社会意识普遍形式并已上升为“科学”的思辨哲学与革命实践的矛盾性。“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④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给德国现实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⑤马克思对德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与批判，实质上就是表达了德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⑥

马克思将现代化和人的解放作为现代社会实践需要的时代意蕴和历史原则，不仅洞见了现代性的真实意义，而且也提出了现代理论的历史走向。“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⑦如上所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作了深入批判，揭示了它的哲学本质和历史观。此外，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层面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思想本质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关系。马克思十分不满这些“学术代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神圣化、终极化的论调：“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⑧将资产阶级制度说成是“天然的”，将资本看作是在一切社会起推动作用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自然主义手法和共同的观念。在资产阶级那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的根据的资本是既定的自然前提，也就是说，资本是一个超人类活动的存在物，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历史”，资本这一现代性是不证自明的。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这种自然主义手法集中体现在对资本的辩护之中。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从来不是一个超人类活动的存在物，“资产阶级即资本”^⑨。“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9～4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8页。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原则和根据,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掩盖了它的本质特征。“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②现代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物化现象表明,资本不仅摆脱了它的最初形式,而且离开了劳动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所以说资本的现代化就是资本的神秘化。马克思以商品的经济学分析为起点,揭示了劳动产品的各种现实形式及其演变,从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人分离与对立的实质。“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③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批判,也是一个哲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④马克思将资本的超历史性还原到历史过程中,从而彰显了历史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般的结果的概括。”^⑤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前提,从“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⑥描述历史、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从而创立了现代社会“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认识的新时代,为真正实现现代社会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同一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此,恩格斯说得十分清楚:“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⑦

三、理论自信: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建构

马克思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现象。全球化不仅迫使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调整,而且也促使了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立,不仅表现了现代性由单—走向复杂,而且也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

在当代,这一挑战主要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派。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代表了自由和民主。哈耶克将经济自由看作是任何其他自由的前提,而“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⑧。在哈耶克看来,“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⑨。哈耶克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将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与自由分离与对立。这不仅是对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而且也是对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当然,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弄清楚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的具体构想,而是要弄清作为—位“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什么要批判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显然,哈耶克不只是从经济学的立场看问题的。哈耶克之所以竭力主张私有制,倡导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在于他将私有制看作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⑩,认为“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⑪。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扼杀了个人的自由原则、毁灭了人类理性,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说:“集体主义思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⑧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25~126页。

⑩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01页。

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1页。

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①“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②，这也是哈耶克的真实看法。

从哈耶克的这些观点来看，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无外乎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同一，宣扬自由主义理论的现代性价值。所以说在哈耶克自由经济思想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哈耶克看来，只有市场经济才是“通往自由之路”，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真正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哈耶克不仅过分美化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性，而且还将计划经济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这表明，哈耶克并不懂历史辩证法。尽管哈耶克自我宣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③，但是哈耶克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教条主义的。早在19世纪以自由竞争为核心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④“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⑤。

从当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有很大的思想市场，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论断无疑是一句妄语，他所颂扬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在当代全球化实践活动中陷入困境。事实表明，现代性的矛盾与风险，恰恰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说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并不适合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如何跳出哈耶克的“教条”，走出一条不同于和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表明，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良心，需要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科学理论，需要建构中国现代性。换言之，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实践的直接同一和内在统一。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中国人民变革现实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要完成这样的宏伟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单单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市场经济建设也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易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充分调动、培育和发挥人的主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塑造现代人格的自主性品质、法治精神和规范意识。所以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建构，对人的主体性吁求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要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主体性问题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从现实的层面看，许多现代化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不是来自科学和制度层面，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层面。中国现代化面临最大的实际问题是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主体性问题纯属一个现代性问题。从西方哲学史来看，虽然可以将主体性探索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它和笛卡尔所开创的“我思”主体性建构的路径并不一样。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不乏现代性建构的可贵资源，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民本”思想早已有之，但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诉求，并未从哲学的层面上将人的主体性问题凸显出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思想、特权观念和人治习惯就是人的主体性缺失的重要表现，这些封建性至今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和必须加以克服的传统性因素。所以，如何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使理论需要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建构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进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两重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活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①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57页。

②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32页。

③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

的理论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活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活动,它为主体的性和现代性建构开辟了现实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活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建构过程,它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活动是更高层次的主体性建构。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活动中曾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一是还没有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的自觉而明晰的意识,对中国化的理解缺乏现代的内容;二是还没有充分形成问题意识,过分侧重于范畴和体系的研究,很少从现代化的实践中提炼问题 and 研究问题。”^①这两个缺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体性建构还不够充分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and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活动而不能偏离历史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旨趣当然不拒斥学理上的探求和学术上的追求,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哲学无疑具有极高的抽象性。但是,抽象性只是哲学的“外观”,而不是其远离现实、脱离实践的内在根据。在哲学史上,不乏以抽象拒斥现实、将哲学当做个人私语的实例。历史证明,这样的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始终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真正的哲学必须关注现实。哲学家所要做的,不是分离这二者的关系,而是何以实现它们的视界融合。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旨趣首先表现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出发,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需要。“中国化”同时也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要求。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从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现代化”就是“中国化”实践活动的根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生命力和科学性就在于它始终将理论置于实践之中,从现实的根基处生成理论的生长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思想旨归,从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问题意识、主体性意识,这不仅是“中国化”的实践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越来越凸显其切中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优越性。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意蕴也就在这里。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需要和理论需要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现代化建设中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所掌握的“思想武器”,除了“中国化”之外,别无他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现实建构,它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需要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需要的具体的现实的同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信的当代体现,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良心。

●作者简介:刘国胜,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LZ020);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Z042);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SQ11043)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